



第七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02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应秘书长要求，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启动了关于全球军事开支专题的两年期工作方案。咨询委员会头两届会议分别于 2022 年 2 月和 6 月举行。

咨询委员会认识到，这项主题始终难以取得进展。尽管如此，委员会认为其任务是相关的、及时的，尤其鉴于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极具挑战性和动态性，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敌对关系、军备竞赛般的事态发展和信任赤字都有可能产生意外的战略后果。委员会认识到，军事开支是多方面、多用途的，受政治和政策选择的驱动，鉴于地缘战略紧张局势加剧和武装冲突持续不断，委员会预计近期军事开支将继续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各国面临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引发的严重经济压力，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委员会强调需要开展外交努力并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此外，需要采取复杂办法，促进秘书长所寻求的军事开支“转型”，避免不理解推动这种转型的目标和利益以及区分军事开支类型的必要性的解决方案。这包括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自卫权，在应对自然灾害和卫生危机或保护处于危险局势的平民时采用同样的复杂办法。

在此背景下，委员会与外部专家以及外部专家之间深入讨论了下列问题：
(a) 联合国在削减军事开支和提高透明度方面的历史作用；(b) 驱动因素，包括供求、安全威胁与感知、国内背景、政治经济和决策；(c)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

* A/77/150。



的影响，包括军事开支的社会经济后果，以明确联合国和各国可对减少当前和中长期军事开支作出积极贡献的领域。

委员会审议了几个可能采取行动的领域，并将在明年继续审查和完善这些领域，以便将其纳入提交大会的 2023 年报告。这些领域包括鼓励预防冲突、缓解冲突与建设和平活动，包括通过外交举措；更新现有的研究、数据和分析，更新对 21 世纪军事开支的理解，促进加大政策行动的对话力度；继续开展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努力，包括采取行动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以产生积极的激励措施，限制挑衅性的军事开支；审查如何扩大安全概念的范围，以纳入非传统的跨国威胁，如与气候变化或大流行病有关的威胁，以及对相应调整财政分配的影响；促进联合国同区域组织的协作，推动区域讨论会和讲习班，促进关于军事开支和能力的透明度和对话；加强全球公众对裁军和军控的支持，包括对军事开支的认识，以鼓励采取政治行动扭转全球军事开支上升的趋势。

委员会以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董事会的身份，审查了裁研所目前的方案、活动和财务情况，包括目前为加强政策影响、实现财务可持续性和进一步扩大全球参与而作出的努力。委员会听取了关于纽约联络处的活动和初步影响以及作为裁研所四年战略框架一部分的下列两项举措的情况通报：(a) 强调未来和前瞻性办法使裁研所能够在当前和新的项目领域探索跨方案裁军前景的工作流程；(b) 把裁研所教育和培训学院作为汇集裁研所目前和今后各种教育和能力建设活动的平台。委员会批准了裁研所主任关于裁研所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活动的报告以及 2023 年拟议工作方案和财务计划。

一. 导言

1. 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于 2022 年 2 月 9 日至 11 日以视频方式举行了第七十七届会议。会议日程有所调整，因当前的冠状病毒病(COVID-19)全球大流行，委员会无法按原计划于 2022 年 1 月在日内瓦举行到场会议。委员会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至 30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第七十八届会议。委员会主席艾丽莎·戈德伯格(加拿大)主持了 2022 年的两届会议。

2.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38/183 (O)号决议提交。由于委员会两年期工作方案刚刚过半，本报告仅反映截至目前的一些主要情况。将在委员会第八十届会议后，向秘书长提出更多的正式建议。委员会以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董事会的身份批准了裁研所主任的报告，报告已在 A/77/144 号文件中提交。

二. 实质性讨论

A. 形势与背景

3. 咨询委员会应秘书长的请求，在第七十七届和七十八届会议期间启动了审议全球军事开支专题两年期工作方案。

4. 秘书长的请求反映了他 2018 年以来始终强调的重点，即需要加大预防和结束武装冲突的行动力度，并关注军事开支不断增加的问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军事开支首次超过了 2 万亿美元。¹

5. 秘书长在《保护我们的共同未来：裁军议程》中，建议国际社会重新考虑“不受限制的军事开支”，² 加强对话和密切合作，在军事问题上建立信任，更加全面地理解支持国家安全并支持社会、社区和公民个人安全的安全手段，而不仅仅是军事手段。

6. 秘书长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报告中再次谈到这一主题。他在 2021 年报告中将扭转全球军事开支趋势确定为十年中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有关的五个目标之一，并建议联合国与民间社会组织携手开展创新运动，利用新的数据和证据倡导以人为本的政策和削减军事开支。³

7. 秘书长在 2021 年 9 月发布的《我们的共同议程》中，界定了“保护和管理全球和平公益物”的必要性，要求“更好地理解维持冲突的潜在驱动因素和影响体系，重新商定更有效的集体安全对策，并采取一整套有意义的步骤管理新出现

¹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0 年世界军事开支攀升至 2 万亿美元”，2021 年 4 月 26 日。可查阅 www.sipri.org/media/press-release/2021/world-military-spending-rises-almost-2-trillion-2020。

² 《保护我们的共同未来：裁军议程》(联合国出版物，2018 年)。可查阅 www.un.org/disarmament/wp-content/uploads/2018/06/sg-disarmament-agenda-pubs-page.pdf。

³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报告(S/2021/827, 2021 年 9 月 27 日)。

的风险”。⁴ 关于实现这一目标，秘书长强调需要制定新的“和平纲领”，重点更新“我们对裁军的展望，保证人类、国家和集体的安全”。这将包括投资预防冲突与建设和平，可能涉及一系列承诺，包括“减少过度的军事预算，确保充足的社会支出；调整发展援助应对冲突根源并维护人权；裁军与发展机会相联系”。

8. 秘书长通过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在委员会 6 月会议上的发言，向委员会成员提出了进一步指导。自秘书长最初要求委员会成员考虑以创新方式解决军事开支问题以来，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秘书长指出，当前的全球环境十分暗淡，乌克兰的武装冲突对当代国际秩序及其全球和平与安全架构构成最大挑战之一，是武装冲突毁灭性影响，特别是对平民毁灭性影响的残酷体现；秘书长并强调了委员会工作的相关性。秘书长回顾，一段时间以来，裁军和军控架构承受着巨大压力，他对军事开支继续攀升、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利用不足、主要军控文书被弃之不用表示关切。秘书长强调需要寻求建立更有效的国际安全安排，纳入裁军和军控，他请委员会考虑联合国还可以采取何种行动，超越国家和军队重新构想安全，并考虑到社区、社会和个人的安全。他提出下列三个问题，为委员会的讨论提供指导：

- 我们有何机会加强透明度、建立信任和实际对话，作为储存武器的替代措施？
- 我们如何构建有效、持久、基于合作的安全架构？
- 我们如何促进对军事开支的新的、变革性的思考？

9. 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在两届会议上向委员会通报了情况，指出遏制军事开支是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长期承诺，早就需要为此重新作出努力。她注意到令人担忧的地缘政治气候和全球裁军、不扩散、军控制度的状况，指出近几十年来军事现代化、采购和支出的上升趋势是不信任增加和紧张局势恶化的结果和起因，和平解决冲突难度加大，特别是在建立信任和与安全有关的合作程度较低的区域。她说，实现更加和平的未来需要对当前的情况进行诚实和务实的评估，要抓住积极的机会，减少在近期内对地缘战略关系采取对抗性做法的可能性，从而减少军事开支的相应增加。为了改变这种事态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更加全面的安全观，并应减少对军事装备的依赖。根据战略远见的概念，高级代表要求委员会考虑世界更加安全、更有保障、和平与发展得到应有重视、共同繁荣得到加强这样一种可能的未来，确定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强调联合国能够充分增值的领域。

B. 专家发言和讨论

10. 在两届会议上，委员会受益于外部与会者的一系列专家发言和问答，他们来自不同地域和冲突管理、国防经济学、军备控制、可持续发展、人的安全、性别平等不同学科。

⁴ 《我们的共同议程》(联合国出版物，2021 年)。可查阅 www.un.org/en/content/common-agenda-report/assets/pdf/Common_Agenda_Report_English.pdf, pp. 59-60。

11. 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为确定今后的工作方案进行了初步探索。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事开支和武器生产方案高级研究员 Nan Tian 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反对武器贸易运动研究协调员 Sam Perlo-Freeman, 从其对全球军事开支的研究角度, 介绍了过去二十年推动军事开支上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驱动因素, 审视了国家、区域和全球支出数字及其随时间的演变。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 Madeleine Rees 和 Ray Acheson 从民间社会的角度阐述了削减军事开支和提高透明度的长期努力、当前全球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效力以及军事开支对人权、福祉和环境可持续性造成的损害。

12. 委员会第二届会议重点讨论了驱动因素, 包括审议供求问题、安全威胁及感知、国内背景和政治经济决策, 以及军事开支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影响, 包括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两个专家小组为此提出了观点和建议。

13. 第一小组的发言者从地缘战略和国防经济学角度进行了阐述。国际危机组织联合国主任 Richard Gowan 概述了全球主要热点, 阐明了现有的威胁感知和信任赤字。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防经济学高级研究员 Fenella McGerty 谈及区域“供求”发展和趋势, 并就人工智能和网络空间等技术发展对军事开支的影响提出了见解。非洲联盟驻苏丹联络处高级政治顾问 Wuyi Omitoogun 概述了非洲军事开支、预算和决策的驱动因素, 强调根本原因往往具有社会经济性质, 显示投资失衡、缺乏协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高级研究员赵通述及亚太地区军事和武器能力开支增加的驱动因素, 以及减缓军备竞赛、建立信任、为裁军和军控创造机会的可能性。

14. 第二小组发言者从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角度审议了军事开支问题。非洲风险能力小组现任非执行主任 Jennifer Blanke 从政治经济角度对当前全球发展和环境趋势及其与军控和裁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她建议加强安全和发展专家之间的互动, 培育对共同挑战和解决方案的整体理解。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Ruth Carlitz 介绍了最近一项关于军事开支与人类安全支出的研究结果, 强调了军事开支的一些机会成本, 特别是在受冲突影响国家。菲奇堡州立大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副教授 Adem Yavuz Elveren 谈到战时与平时时期军事化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明显联系, 应把提升民主和加强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的缓解因素。西印度群岛大学加勒比可持续发展教授 Anthony Clayton 主张在确定军事开支时更准确地把握不安全的原因, 并主张加强对紧迫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定位。这些问题具有社会经济和环境性质, 并不一定需要诉诸军事行动, 也不一定有利于军事行动获得资源的方式。

15. 最后, 委员会讨论了联合国和会员国过去在这一领域开展的举措及其成就和不足。裁军事务厅政治事务干事迈克尔·斯皮斯回顾了联合国削减军事开支努力, 包括同时开发分享信息和国家军事开支比较手段的历史。他建议采取几项可能的措施, 包括更新研究, 改善联合国军事开支报告中军事开支官方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

16. 专家的详细要点和建议见本报告附件一。

C. 委员会的讨论和可能的前进道路

17. 委员会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及时性和战略意义，尤其是由于令人担忧的地缘政治环境，欢迎有机会持续思考军事开支增加的问题，希望提出新的视角和建议为秘书长提供支持。委员会认识到，鉴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跨学科性质以及现有的各种观点，委员会的任务十分艰巨。委员会还注意到，以前这一领域的工作成效甚少，安全理事会没有履行《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义务。委员会强烈认为，任何方法都应重申和促进外交和合作工具以及裁军和军控工具，作为预防、缓解、解决冲突以确保我们共同未来的关键因素。

18. 鉴于秘书长指出“各国通过武器而不是对话寻求安全”的评论，委员会强调和平是最重要的全球公益物之一，并回顾了联合国作为一个必须帮助各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机构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委员会重申这一关切，即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方面经常处于瘫痪状态，近年来支撑当代国际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基本原则，包括《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来源所载的原则受到侵蚀，强调必须加强这些原则。委员会强调，世界面临重大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不平等和全球各地许多残酷的武装冲突，如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克兰和也门造成死亡和人类痛苦的武装冲突，迫切需要投资外交，并准备寻求合作对策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19. 在这方面，正如秘书长所建议，有必要重新界定全球对安全的理解，以更好地解释社区、社会和个人以及环境的安全。

20. 委员会强调，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加强多边系统及其机构的基础、运作和问责。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世界正处于重大转折点，必须形成共识，合作解决共同问题，而不是进一步分裂。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紧张的、有时崩溃的裁军、军控和不扩散制度、对特定类型的新旧军备的现代化和发展增加投资、当前令人担忧的国际环境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委员会认为，酌情维护并加强现有的不扩散、军控和裁军制度，包括通过促进信任和建立信任以及推进双边、诸边和多边外交，是重新制定应对当今世界现实、挑战和事态发展的相关战略的重要基础。

21. 在两届会议上，委员会与专家以及委员会成员之间进行了深入讨论，思考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可以为减少近期和中长期军事开支作出积极贡献的领域。一些成员还提供了书面投入，为委员会的审议提供信息。

说明和数据的可得性

22. 委员会初步讨论的重点是，说明和界定军事开支问题的范围，评估部分现有数据。委员会同意从不同角度看待军事开支，而且绝对数字只能反映局部情况。委员会指出，需要了解军事开支在特定情况下所处的总体背景，并认识到可能没有统一的公式来解释今天或过去的军事开支。

23. 委员会强调，需要对这一问题采取一种复杂的办法，避免不区分军事开支类型或不承认军事开支并非完全必要或有问题的解决办法。例如，委员会几名成员

指出，军事领域的某些技术进步在民事和社会部门意外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同时意识到有时没有对开展此类活动的民间能力进行充分投资。委员会回顾，《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有进行自卫的权利，安全理事会和大会近年来也一直强调某些类型的军事活动、援助或行动可能有助于加强和平与安全。

24. 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与其明确强调减少军事开支的绝对数字，不如解决军事开支的潜在和驱动因素，特别在区域或全球安全关切方面。委员会讨论了是否能够通过更好地了解并解决推动某些重大和潜在挑衅性军事开支的潜在因素、鼓励各国超越军事解决方案，使资金转用于气候行动和不平等等其他紧迫的优先领域。

25. 委员会在削减军事开支的影响的讨论中认识到，削减军事预算不会自动导致资金在内部或外部的其他领域重新分配，例如用于社会安全网或可持续发展。如何支持预算项目的过渡使资源可以有效地投资其他地方，需要加以进一步考虑，可以通过案例研究等方式进一步探讨。此外，必须切实考虑并充分解决军工行业和人员转型的经济影响和后果。

26. 委员会在讨论中注意到，研究方法中的几个数据缺口和方法制约对全面理解军事开支的规模和影响构成障碍。首先，虽然定量开支数字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但关于国家由此产生的定性能力，包括核武器、网络能力和全自主武器系统方面的信息相当稀缺。第二，严重缺乏(可比较的)采购或研发信息，而采购或研发是(感知的)安全威胁的重要因素，并引发其他国家被动增加军事开支。第三，地理和空间类别的使用并不反映跨越这种地理分类的军事防御联盟的军事开支总额。委员会认为，对(若干)这些领域的研究可能有助于更新对 21 世纪军事开支的理解，并为对话和外交行动指出了可能的前进道路。

全球、区域和国家的趋势、驱动力、影响及社会经济后果

27. 委员会试图了解支撑和推动军事开支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因素、观念和体制结构。为此，委员会讨论了供求动态、威胁和威胁观念的影响、避免冲突和解决冲突努力的重要性、武器采购在外交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国家内部制度化的政治经济和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军事防御联盟的影响。委员会还简要探讨了非国家行为体的军事开支问题，以及由于国家或犯罪组织的开支以及军事和政治战略向此类团体提供武器的问题。

28. 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初步意见。首先，委员会认识到军事开支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它是多方面、多用途的，受政治和政策选择的驱动。成员们对投资军事和防御能力的必要性不持异议，但对当前开支是否充分反映实际和新出现的威胁环境以及这种投资是否会进一步加剧不稳定进行了辩论。第二，委员会讨论了军事预算和军事开支的构成如何受到武装部队组成的影响。在这方面，委员会辩论的焦点是：为保持发展和生产能力而不断发展改进型武器系统的必要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军事开支增加的因素。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就业和武器出口决定之间的联系，以及出口国和进口国军事开支增加的可能性。第三，委员会考虑了新

兴技术在战争中的使用和发展，以及新兴技术可能影响未来军事采购和开支的程度。成员们表示担心，这可能助长破坏稳定的类似军备竞赛的事态发展，进攻和防御能力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以及新能力开支更多的倾向，即使这些能力并不反映对实际威胁环境的评估。最后，委员会讨论了各国之间关系和当前信任赤字及其在推动军事开支决策方面的作用，并一致认为，开展外交接触和对话以及寻求加强裁军、军控和不扩散努力，包括通过以合作安全概念为中心的行动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有着明确的范围和迫切的需要。委员会将进一步审查推动这种努力的机会，以扭转这些趋势并创造积极的激励措施。

透明度与建立信任

29. 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的请求，即寻找机会加强透明度、建立信任和切实对话，作为对储存武器和战争计划的替代。委员会认识到，透明度并不能自动保证加强国家之间的安全或信任，但委员会指出，提高透明度可以作为减少不确定性的手段，这种不确定性会加剧某些国家之间的竞争，并因此推升军事开支。委员会认为，这种措施有助于实现问责，并且可以成为促进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就安全关切重新进行认真接触的努力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军事开支数据库和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以及其他单边、双边、区域、多边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效用和潜力，这些措施可以减少敌对行动的可能性，有助于避免升级，消除军事行动和政策所产生的看法和误解，而军事开支则是军事行动和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委员会注意到每个国家都处于独特和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中，受到国内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因此认为可以审视如何最好地利用并扩大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作为区域、次区域或双边安全对话的专门切入点，并有可能为在安全问题上采取更大胆的合作行动奠定基础，转变关于国家安全要求的观念，促进公民社会经济条件的进步。在多边一级，委员会简单地谈及有必要着重促进外层空间等新兴领域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在这些领域，关于国家空间安全政策和军事开支的信息交流措施可以切实助力弥合现有做法的差距。

30. 委员会认识到军事开支、态势、联盟的跨国和跨界驱动因素和影响，讨论了区域办法的潜力。委员会注意到区域组织在建立并实施安全和社会经济目标与框架方面发挥的战略作用，使区域论坛成为各国讨论和反思军事开支的可行场所。这种论坛考虑到涉及邻国的具体关切，并有助于改善安全氛围以及应对非军事安全威胁的新思维和新方法。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间加强交流和制定新举措的潜力，可以探讨如何推广区域研讨会和讲习班，促进透明度和对话。委员会将在今后的会议上继续探索这方面的潜在途径。

31. 委员会讨论了安全理事会下设的军事参谋团，军参团没有履行《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义务。委员会讨论了是否可能在多边环境下进行军方之间的讨论，无论是通过振兴和扩大现有机制(如军参团)还是建立新的机制，如大会设立新的军参团或专家组。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国家之间，特别是核武器国家之间，可以进一步加强双边一级的结构性军事交流，这种交流可以解决一系列问题，包括与军事理论有关的问题。

32. 委员会认识到这一专题的交叉性质和多种影响，包括军事开支可能以多种方式影响国家、公民、气候与环境和平等，并探索今后的工作是否能够确定哪些行动会扩大关于安全构成的概念和说明。

33. 在这方面，委员会用大量时间讨论了国际社会如何面对传统的安全威胁(如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武力和暴力威胁)和非传统的跨国威胁(如与气候变化和流行病有关的威胁)。委员会指出，军事手段不是为了应对这些非传统威胁，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减轻这些威胁的影响。委员会指出，气候变化可能会使地球上的部分地区变得不适合居住，对人民、可用资源和生计造成灾难性影响，很容易让人预见冲突增加的未来。因此，应把紧急应对这一挑战视为一项预防冲突措施，但是委员会指出，气候变化和其他可能引发冲突的社会经济挑战有时被视为对公民福祉、安全安保的严重威胁，因而也是对国家的严重威胁。委员会决心进一步探索可能的途径，以对 21 世纪的威胁和风险形成更广泛、更全面的安全概念和安全开支概念。

研究、分析与数据

34. 为响应秘书长的呼吁，委员会探索了如何促进关于军事开支的新的变革性思维，讨论了新的专门研究领域如何提供当代和历史评估，为国内和国际讨论提供信息并加强讨论。大会授权进行的研究可以极大地促进对裁军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高质量分析，并增进对军事开支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后果的新的了解。委员会注意到，上次此类分析大约在 30 年前进行，没有包括军事开支所计划和促成的战争的实际和预期影响。新的分析应考虑到当代的优先事项，包括与气候变化、政治制度和性别平等相关的事项。除新研究的内在价值之外，委员会还将学术和以政策为导向的研究作为增加军事开支方面现有专门知识和能力的工具，从而形成进一步突出这一问题的强大推动力。

35. 讨论中提出的可能开展研究或案例研究的其他领域包括：**(a)** 减少军事开支的积极驱动因素和先决条件，包括军转民的成功例子；**(b)** 审查削减军事开支的影响的各种情景；**(c)** 具体国家、国家集团和防御联盟的开支模式，包括潜在的国内、结构和政治原因；**(d)** 国家的质的能力；**(e)** 地缘政治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f)** 已经发展和采购但没有使用或很少使用的武器系统，可以表明影响总体军事开支的因素；**(g)** 军事援助和债务水平之间的联系；**(h)** 深入评估和比较军事开支的惠益及长短期负面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与生态外部因素，以及这种开支促成的平时时期和(备战)战争时期的军事活动；**(i)** 战争，包括核战争的代价和后果；**(j)** 军事开支的详细分类，以便对预算项目进行系统分析，特别是在采购和研发方面。委员会认为，这种研究可以为军事开支选择进行更加知情的需求和成本效益分析提供基础，同时可能开辟将浪费和不必要的开支转用于其他领域的途径。

36. 委员会还讨论了联合国加强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潜在机会，包括更好地利用联合国军事开支数据库的潜力。该数据库仍然有效，但利用较少。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存在将联合国定位为一个相关、中立、可利用数据和信息中心的空间，包括为政策专家、裁军工作者和公众提供联合国军事开支数据库特有的可比目，

如按研发分列的细目。在这方面，裁军事务厅最近执行数据战略的努力得到了认可，并被鼓励继续推动这项努力。

外联与倡导

37. 委员会注意到，联合国实体和民间社会团体过去和现在为提高对重大全球问题的认识并为此动员支持作出了不可或缺的努力。例如，委员会指出，世界青年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倡导紧迫的政治领导、系统变革和果断行动，避免出现最坏情况，为所有人创造更美好、更安全、更有保障的未来。委员会认为，对裁军和军控的类似支持，包括围绕军事开支的支持，可能提高公众意识，并利用这种意识采取政治行动。委员会注意到采纳性别平等观点的重要性以及教育、公共宣传和令人信服的多种叙述在这方面的作用，决心继续探索发起或加强这种努力的方式。

38. 此外，委员会认为，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处以及相关实体、基金、方案应扩大宣传努力，包括通过全球和专项裁军运动，并更有意识地利用召集能力。在这方面，委员会强调，参与性和包容性方法至关重要，可以带来在国际安全讨论中并不总能找到空间或立足点的声音、经验和观点。

三.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董事会

39. 裁军事事项咨询委员会作为裁研所董事会，于 2022 年 2 月 8 日和 6 月 27 日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议。由于疫情，第一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并压缩了会议时间。第二次会议以混合方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在这两次会议上，委员会听取了裁研所主任罗宾·盖斯和裁研所几位工作人员关于裁研所活动执行情况以及预算和人力资源相关事项的情况通报。6 月会议还介绍了纽约联络处的活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空间安全方案(James Revill 介绍)和性别与裁军方案(Renata Dalaqua 介绍)。2022 年 4 月与现有的董事会成员举行了临时非正式会议。会上，与具体方案的负责人进行了补充讨论，审查不断发展变化的研究领域。

40. 在 2022 年 2 月的会议上，董事会确认裁研所 2021 年继续保持韧性和灵活性，并注意到，尽管 COVID-19 大流行带来持续挑战，但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2021 年，裁研所主任首次应邀正式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这是裁研所在纽约新设的小型试点机构取得的成果。主任将在董事会 2023 年 6 月会议上报告纽约联络处的影响。最后，大会于 2021 年批准了董事会关于增加裁研所经常预算补助金的长期建议。此举有助于促进裁研所的机构稳定，提高召集裁军、军控和不扩散相关审议会议的能力，并促进所有会员国知情参与审议。

41. 董事们注意到，如主任和副主任所述，巩固裁研所的研究方案结构、为裁研所的各项研究方案制定新的多年跨学科研究战略(2022-2025 年期间)、以及寻求裁研所资金来源多样化将会带来的利益。

42. 董事会与主任的讨论注意到，持续增长难以维持在过去的水平上(2018-2021 年期间)，主任对巩固、优先事项和伙伴关系的持续强调仍然十分重要。委员会指出，由于大流行造成的不确定性，一些捐助者减少了捐款，某些捐助者资金受到

限制，只能资助符合官方发展援助条件的活动。主任指出，虽然这项限制导致资金短缺，但基本被其他捐助者的几笔超出预期的捐款所抵消。因此，2021 年的总收入为 650 万美元。仅比 2020 年减少 30 万美元。2021 年，支出增加 60 万美元，总额达到 670 万美元。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由累积资金的结转吸收。

43. 董事会注意到裁研所 2022 年的备选预算方案：690 万美元的保守伸缩计划和 850 万美元的理想成本计划。董事会还注意到裁研所重新开始有效监测和加强财务及其他重要行政数据，从而加强管理监督和决策。

44. 董事会听取了关于裁研所修订的资源调动战略的情况介绍，情况介绍非常及时，裁研所的大多数大型多年供资协议已于 2021 日历年结束，而且裁研所收到的大量自愿捐款(85%以上)用于指定用途。董事会赞扬裁研所继续努力实现捐助基础多样化，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包括通过与基金会、私营部门和个人进行外联。董事们注意到裁研所有能力从一个通过联合国基金会审查的慈善实体获得资金，并主动单独或通过董事会主席支持裁研所的事业，从战略上支持其资源调动工作。

45. 董事会听取了作为裁研所四年战略框架一部分的两项举措的情况介绍：强调未来和前瞻方法使裁研所能够探索当前和新的项目领域的跨方案裁军前景的工作流程；裁研所教育和培训学院，作为汇集裁研所各种当前和未来教育和能力建设活动的平台。董事会感到鼓舞的是，裁研所扩大并加强青年参与，利用下一代声音的力量(董事会曾经提及)，并注意评估裁研所伙伴关系和研究网络以充分发挥影响力的计划以及进一步利用全球专门知识和研究人才库并使其多样化的计划。

46. 董事们注意到裁研所与联合国大学就“管理武装冲突退出”项目的过渡进行的深入讨论，该项目符合裁研所在常规武器和弹药领域的任务和工作计划。董事们要求在 6 月会议上通报裁研所伙伴关系的发展情况，以及可能存在的差距和未来的机会。董事们还讨论了裁研所如何最好地展示影响力，特别是通过跟踪和展示政策影响力。

47. 董事会认识到裁研所的方案结构得到巩固，外层空间安全相关工作自 2022 年起升级成为单独方案。董事们鼓励裁研所继续支持国际社会在充满挑战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下寻找重振多边军控和裁军的途径。鉴于多边裁军议程的广度和复杂性，董事会强调需要继续关注优先事项，并鼓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48. 2022 年 4 月 28 日，委员会以视频方式举行非正式闭会期间会议，各方案负责人向董事会成员介绍了新的研究分析优先领域。讨论特别使董事会新成员有机会与裁研所领导团队进行接触，并听取有关裁研所战略方向、方案和工作流程的介绍。董事会建议，这种情况介绍应纳入今后新成员的入职培训。

49. 在 2022 年 6 月 27 日会议上，委员会审议并批准了 2023 年拟议工作方案和财务计划。在这方面，董事会注意到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对主任报告草稿的评论和建议，董事会已经着手处理。董事会和主任讨论了主任的年度报告，并强调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裁研所作为公正研究的提供者和国家间微妙议题

讨论的召集者和推动者的作用，强调支持建立透明度措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50. 董事会注意到，2022年5月增加了一个新的国家捐助方，使各大洲的捐助方总数达到27个。在讨论私营部门参与的参数时，董事会表示有意在董事会今后的会议上介绍这一主题。

51. 主任概述了他打算为裁研所业务编制的两份预算：一份是裁研所的主要计划活动，反映预期收入的估计数；另一份是理想预算，包括裁研所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希望开展的额外活动。两项预算将使裁研所能够将筹资纳入全年的外联规划，并根据收到的资源调整产出。

52. 董事们赞扬裁研所努力扩大外联活动，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合作举办执行简报会，并与联合国图书馆合作举办探索日。董事们还向董事会简要介绍了裁研所的以青年为重点的活动，包括成功实施研究生专业方案、模拟联合国和论文竞赛。董事们表示，需要继续关注研究生专业方案候选人的无障碍环境，使更广泛的候选人群体能够获得机会，这将对建设更广泛的区域能力以及对裁军和军控事务的兴趣产生长期的连锁效应。董事们还审议了裁研所新设立的同行审议程序。董事会欢迎这一新方法，特别是从头强调如何展示出版物。

53. 向董事会成员介绍了裁研所各种协作和伙伴关系的发展情况，目前在六大洲有90多个协作和伙伴关系，但仍集中在欧洲和北美。董事会成员感兴趣地注意到裁研所计划建立全球裁军研究网络，并且随着管理部门进一步确定参数，鼓励制定明确的研究目标和优先事项。董事会鼓励裁研所利用这种方式加强研究专门知识的多样性。董事会要求裁研所分享一份更全面的按裁研所研究和行动优先领域分类的合作概要。董事会讨论了制定明确参数的必要性，以便对伙伴关系和协作形成共同的双向理解。

54. 董事会听取了关于纽约联络处的活动和初步影响的介绍。纽约联络处投入运作一年，帮助建立了与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其他部门合作的新途径。委员会鼓励裁研所再接再厉，并考虑如何向纽约常驻团提供目前的实质性简报会和情况介绍会。主任指出，联络处的一名干事不再租用办公空间(远程办公)，节约了成本。由于纽约的大部分工作与常规武器和弹药方案有关，大约80%的薪金和业务由裁研所预算项目的这一部分支付。其余20%由其他方案和机构资金支持。

55. 向董事们详细介绍了裁研所空间安全方案以及裁研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案召集的裁军、威慑和军控对话。他们认识到这两个领域未来研究机会的计划增长。董事们鼓励裁研所根据资金情况，寻求继续开展并扩大裁军、威慑和军控对话，将其作为一种宝贵和实用的形式。还审查了裁研所性别与裁军方案的横向性质，特别是裁研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空间安全、常规武器与弹药、安全与技术方案以及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项目当前和未来开展的活动。董事会成员对裁研所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并强调继续跟踪影响的重要性。

56. 最后，主任向董事会成员介绍了确定、捕捉和报告裁研所工作具体影响和受益者的初步愿景草案。董事会成员提出了看法，鼓励进一步完善这一框架。董事

会成员指出这种改变需要时间，并将继续成为裁研所近期的一个重点工作领域。将定期向董事会报告最新进展情况。

四. 今后工作及其他事项

57. 委员会 2023 年将继续执行工作方案，并受益于体现背景、专长、国籍、年龄、性别多样性的专家意见。委员会将在秘书长提交大会第八十届会议的关于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工作的 2023 年报告中就上述事项提出建议。

附件一

裁军事事项咨询委员会第七十七和七十八次会议专家发言摘要

第七十七次会议

1.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事支出和武器生产方案高级研究员 Nan Tian 在委员会第七十七届会议上发言，从数量上介绍了不断变化的开支趋势。他指出，军事开支从冷战结束时开始下降，但 1990 年代末以来又稳步上升，2020 年估计达到 2 万亿美元，前 15 个最大军事开支国占全世界总额的 80% 以上。Tian 先生表示，COVID-19 大流行导致经济整体下滑，但军事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即所谓的军事负担，已上升到全球平均 2.4%(高于 2.2%)，反映出各国为应对感知安全威胁等实现新技术带来的新武器现代化和发展的政治愿望。Tian 先生强调，目前的数据仅反映部分情况，显示由于缺乏透明度和一些国家的预算外支出而低估了军事开支。

2. Tian 先生认为，为扭转目前的上升趋势，激励各国考虑其他解决方案，应加大工作力度来反驳维持军事开支上升趋势的说法，包括对机会成本进行循证研究，并建立令人信服的论点，指出将开支向可持续发展和加强“人的安全”的气候行动等其他政策领域转移的好处。

3. 联合国反对武器贸易运动研究协调员兼世界和平基金会研究员 Sam Perlo-Freeman 也谈到了趋势线。与 Tian 先生一样，Perlo-Freeman 先生谈到了推升国家军事开支的驱动因素，包括对安全威胁的感知、政治定位和经济能力都得到了增强，特别是在商品价格推动增长的地区。他认为，军事开支存在不正当的动机和风险，包括在监督和治理结构薄弱的地方普遍存在腐败，并提到“军工复合体”在这方面的作用。Perlo-Freeman 先生提出，即使在没有腐败问题的地方，政府与国防公司的密切关系也常常导致采购决定可能有利于工业，但并不反映实际需要。他说，因此军事开支增加可能会加剧而不是减轻不安全，并刺激对军事反应的过度依赖。Perlo-Freeman 先生还强调了军事活动，包括军队的大量碳足迹对环境和气候的有害影响。

4. 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秘书长 Madeleine Rees 和该联盟达成关键意愿组织的 Ray Acheson 强调，军事开支、军事化和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她们认为，军事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表示希望大幅减少碳排放的必要努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军事活动减少。她们强调当今最大的安全威胁是气候变化对地球的破坏，认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并相应地重新制定各项政策，包括军事和安全政策。她们认为，旧的范式、机构和结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5. Rees 女士和 Acheson 女士回顾了妇女运动在促进社会正义和性别平等在遏制军国主义方面的长期作用，认为需要一种新的叙述，包括运用女权主义观点，寻求解决系统性不平等和暴力问题。她们认为，这包括认识到安全理事会等现有机构没有表现出适应这些威胁的能力(应予废除)，联合国需要实施“减速”运动提出的创新和整体战略，特别是非军事化、脱碳、非殖民化和裁军。她们认为，

除其他外，联合国应更积极地参与研究气候变化与军事化之间的联系，促进从维持暴力和不平等的结构中撤出供资，并促进处理气候行动、人权、经济、裁军和人道主义行动的联合国实体加强合作。她们还表示，大会是落实《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的一个可行的替代论坛。

第七十八次会议

第 1 小组：威胁与感知——地缘战略环境

6. 国际危机组织联合国主任 Richard Gowan 介绍了主要的全球热点，分享了他的组织对当前地缘政治背景，包括信任赤字看法。他认为，军事开支与冲突程度似乎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他以非洲为例指出，非洲的军事开支相对较低，仅为 2%，但当前各项冲突中有一半发生在非洲，过去五年冲突数增加了 50%)，但这一问题仍然令人严重关切，尤其是因为这种开支似乎转移了人们对非军事方式解决争端的注意力，并占用可持续发展的资源。Gowan 先生指出，庞大的军事开支进一步加强了战略竞争，并在提到东亚时指出，中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军事开支显著增加，助长了该地区类似军备竞赛的事态发展。

7. Gowan 先生建议把重点放在解决推升军事开支的一些根本问题的投资上，包括建立或振兴军方对话和建立信任措施，以重启关于各种(区域)安全架构和透明度的对话。他建议各国考虑正在部署的安全挑战应对工具和资产，指出国内叛乱可能无法通过大力部署军事资产得到有效解决，或者至少必须同时开展调解与建设和平努力，支持对话和投资，解决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解决跨国恐怖主义实体在当地的附属机构问题。

8. 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防经济学高级研究员 Fenella McGerty 阐述了军事开支“供求”和国防经济学的广泛区域动态和趋势。她建议使用三个类别来预测驱动因素和刹车因素，并指出这些因素因地区和时间而异：(a) 经济条件，包括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以及各国支持本国国防工业的意愿；(b) 战略因素，包括区域威胁、发展新技术和维持一支可信军事力量的意愿；(c) 政治因素，包括联盟成员、国家治理和公众对军事开支的看法。

9. McGerty 女士警告说，军事开支快速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更强的军事能力(或安全)。增加投资而没有考虑到具体目标和所需能力的全面计划，有可能造成浪费，而且军事和国防工业没有能力吸收这种投资。她认为，虽然目前倡导削减军事开支在政治上具有挑战性，但联合国可以发挥作用，促进提升透明度，鼓励以连贯一致的计划配合提升，并促进建立信任措施和对话，解决可能推动不明智军事开支的一些战略因素。

10. 非洲联盟驻苏丹联络处高级政治顾问 Wuyi Omitoogun 分享了他在非洲军事开支和预算方面的独到研究。他指出，与其他区域相比，非洲的绝对开支很小，但相对数字却很高。非洲军事开支的趋势和驱动因素包括武装冲突增加、区域对抗、国内叛乱、政府宪法改革以及对方案现代化的认识需要。

11. Omitoogun 先生认为，尽管军事开支增加，但非洲安全并没有加强，却出现了反政府运动重新抬头、恐怖袭击增加的情况。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暴力和冲突的根源，包括社会和经济需求、社会排斥和缺乏基础教育，没有得到解决。他建议采取一种互补的双轨办法，明确强调为充分和有效管理资源创造有利条件的善治做法和原则，并促进安全概念的重新界定和军事开支的重新调整，以成功解决冲突和暴力的根本驱动因素和系统。

12.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高级研究员赵通探讨了亚太地区军事和武器能力支出增加的驱动因素，以及减缓军备竞赛、建立信任和为裁军和军控努力创造机会的可能性。他指出，广泛而言，军事开支本身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因为各国有不同的经济、战略和区域关切和考虑，而且这些关切和考虑在不断变化。

13. 赵通先生确定了该区域需要考虑的三个重要领域：

(a) 需要解决影响军事开支增长的根本原因，注意到国家间存在的信息和感知差距往往是威胁感知的基础。因此，包括政府官员和政策专家在内的公众在广泛的基本事实问题上的观点分歧越来越大，相互理解和对话难度不断增加。这促成了深刻的战略不信任，反过来又助长了军事开支的上升；

(b) 缺乏透明度、制衡、民主问责和公众讨论，是导致只有通过增强军事力量才能实现国家安全的主导观点的一个因素；

(c) 某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具竞争性、更不可预测，许多区域行为体采取对冲战略，发展本国国防工业，因此在中短期内军事开支出现增加。技术驱动的军事竞争，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网络进攻能力、空间和反空间技术、人工智能和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是另一个驱动因素。赵通先生的结论是，这往往意味着误解、事件和意外冲突升级的风险没有得到重视。

14. 赵通先生提出了联合国实体可以采取的几项缓解措施：(a) 研究现有的信息和感知差距，使其成为全球高级别官方对话处理和讨论的问题；(b) 通过培训和教育方案促进军控和裁军措施，以建设国家能力并提高公众认识；(c) 组织关于区域军控制度和选择的官方和专家级对话和研究，包括具体军控和建立信任建议的技术和政策可行性。

第 2 小组：(重新)构建安全威胁和解决方案

15. 非洲风险能力小组现任非执行主任 Jennifer Blanke 对当前的发展和环境趋势及其与军控和裁军的关系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她回顾，蓝图国家商定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背景下，解决世界指数式但分布不均的经济增长的负面外部性。可持续发展目标 16 涉及和平与安全，但并未直接反映军事开支与发展的联系。她认为应以相辅相成的方式看待这一联系，提出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没有繁荣就没有安全。她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可持续发展的投资也是安全开支。在这方面，她注意到军事研究和发展对刺激(技术)创新或提高生产力的潜在积极影响，这反过来又会对发展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16. Blanke 女士强调，通过在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和可持续能源方面的开支对可持续发展进行投资，可以加强人类安全。她认为，联合国在促进更好理解这些联系方面可以发挥主导作用，包括促成安全和发展领域专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期对共同的挑战和解决方案形成整体和一致的认识。

17. 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Ruth Carlitz 分享了她最近为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编写的论文中的调查结果。论文分析了军事开支与人类安全开支，特别关注旨在惠及妇女和女童的政策以及受冲突影响国家的趋势。她认为，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类别国家国防开支往往相对高于社会保护和促进性别平等政策的开支，是卫生和教育开支的两倍多，而非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类别国家则相反。她指出，在预算执行阶段，国防开支往往高于其他部门，低收入国家的国防预算超支 5%，而卫生和教育等部门往往开支不足。

18. Carlitz 女士认为，许多国家缺乏透明度，成为充分评估军事开支的重大障碍，依赖总体数据可能会导致不良后果(特别是如果捐助者以减少军事开支为援助条件，一些国家政府曾经因此调整预算编制过程)。此外，目前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国政府及其对军事开支分类和报告的酌处权。她认为，可以采取各种步骤提高透明度和数据的可用性，包括鼓励各国向军事开支数据库报告，探索将军事开支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报告框架的方法(指即将开展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联合国支持军备管制合作信托基金试点)，提高公众对预算外开支透明度和合理性的要求，鼓励对预算决策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权衡、决策者和影响力，包括妇女参与影响预算结果的方式。

19. 菲奇堡州立大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副教授 Adem Yavuz Elveren，介绍了他最近为妇女署开展的关于军事化和性别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的主要结果。他指出，各种文献基本表明，军事开支挤占社会开支，加剧收入不平等，女议员人数增加往往导致社会支出，包括卫生支出增加。他自己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平时，军事化与性别不平等之间都有着明显的联系，更高水平的民主和更强劲的经济发展的关键缓解因素。因此，他认为减少军事开支可能会减少性别不平等；应改进民主治理模式，减轻军事开支的负面影响；学术和(经济)政策讨论应注意将所谓的性别视角应用于军事开支，表明增加军事开支对性别平等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20. 西印度群岛大学加勒比可持续发展教授 Anthony Clayton 强调，需要说服政策制定者重新考虑当前的安全定义，安全定义未能充分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威胁，也不一定适合军事对策。Clayton 先生指出，2015 年以来，全球军事开支逐年增加，2021 年达到 2 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他认为，这种投资不适合应对气候引发的风险，如基于资源的争端和被迫移民。Clayton 先生主张开展对话，着重讨论准确分析和定位广泛的紧迫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他认为，这种方法可以提供一个同样有用的视角来审视军事开支及如何将其融入关于减少安全风险的更广泛辩论，强调采用更具成本效益的方法，重点在于适应(采用创新方法来满足粮食、能源和基础设施压力)而不是防御(关闭边境、保障供应)。他认为，

可以通过重新调整现有军事开支、解决避税天堂、消除化石燃料补贴和快速时尚等方法，为这种努力提供资源。

第 3 小组：了解联合国过去开展的工作

21. 裁军事务厅政治事务干事迈克尔·斯皮斯回顾了联合国削减军事开支努力，包括同时发展分享信息和比较各国军事开支手段的历史。他讨论了联合国关于军事开支的报告，认为这是提高军事事项透明度的一个工具，但由于会员国分享信息的方式缺乏统一性和一致性，这一工具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斯皮斯先生并指出，联合国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但正在努力纠正这种情况。斯皮斯先生建议各级采取若干步骤，重新思考军事开支，包括委托进行一项(或一系列)研究，更新军事开支的现有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后果，以推进 1980 年代中期应大会要求开展的工作(说明私营军事公司、气候变化和性别不平等等新问题)。这项工作，以及裁军事务厅为改善军事开支官方数据可及性和可比性所做的工作，包括通过在试点基础上使这些数据在国家之间和一段时间内具有可比性，可以引起受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斯皮斯先生还建议，重新考虑制定量化执行裁军协定所能实现的财政节余的方法，这可能最终导致建立国际筹资机制，将节省的资源用于可持续发展。

附件二

2022 年裁军事项咨询委员会成员名单

蕾娜·哈迪德

大使

约旦常驻联合国和维也纳其他国际组织代表

纳比拉·阿布杜拉·穆拉

科威特城

科威特美国大学杰出讲师兼科威特科技学院董事会主席

刘易斯·邓恩

美国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大使

艾丽莎·戈德伯格(主席)

加拿大驻意大利共和国大使，驻阿尔巴尼亚、圣马力诺和马耳他候任大使，加拿大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代表

让-玛丽·格艾诺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首任肯特冲突解决客座教授

玛丽·卡尔道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治理名誉教授兼 IDEAS 智库冲突研究项目主任

玛丽娜·卡尔尤兰

布鲁塞尔

欧洲议会议员

安顿·克洛普科夫

莫斯科

能源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李驰江

北京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齐亚·米安

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科学和全球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学者
兼共同主任

阿明娜·穆罕默德

内罗毕

肯尼亚体育、文化与遗产内阁秘书

马蒂·纳塔莱加瓦

印度尼西亚前外交部长

艾格霍萨·奥萨盖伊

拉各斯

尼日利亚国际研究所主任

绍尔娜-凯·理查兹

东京

牙买加驻日本大使

玛格特·瓦尔斯特伦

瑞典前外交大臣

罗宾·盖斯(当然成员)

日内瓦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主任
